

以事实为尺度: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与第三方事实核查

李丹林 曹 然*

【摘 要】 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规范和约束机制已不再适用,判断表达者是否恰当地行使了表达权需要探索、寻求新的机制,尤其是针对来自非媒体机构或非媒体职业人士的言论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内容。以美国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Snopes、PolitiFact和The Fact Checker为样本,对网络环境下表达权行使界限问题的研究发现:尽管表达自由仍然是重要的价值,但过去的标准、机制已经不再适应急剧变化的新的网络环境;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出现,为规范言论表达重新确认了“事实”的尺度,为治理谣言、假新闻泛滥的网络空间,保护网络表达自由找到了折衷方案。这对我国规范网络言论以及舆情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网络表达;言论自由;事实核查;社交媒体

传统媒体环境下,媒体上的表达是由专业主义的职业伦理与操作规范以及“把关人”制度进行有效约束和限制的,它是判断一项表达是否超越界限以及表达权是否恰当行使的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机制。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空间中的表达主体成为了无数的网民,过去针对传统媒体的约束、限制不再适用。那么,普通网民的表达是否有具体的规范标准?由谁作出相应判断?如何在滥用言论自由和过度限制言论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需要进行新的制度设计。

一、美国关于表达权的规范和界限

欧文·费斯将美国传统言论自由的模式形象地比作“街头发言者”,即一个站在城市街头肥皂箱上的个人,他正在向路过的行人发表批评政府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言论。在这一想象场景下,言论自由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位街头发言者的言论不受政府剥夺或限制^①。但发言者仅仅站在街头的肥皂箱上是不够的,还要有扬声器,这样它们的声音才可能与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一样传得更远。从这种想象模式出发,有学者指出“媒介”因素没有作为言论自由问题去思考^②,而媒介因素(尤其是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这也是本研究的起点。

在报纸时代,大众媒介充分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或称新闻自由),但它被

*李丹林,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然,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100024。

①O. Fiss, “In Search of a New Paradigm”, *Yale Law Journal*, vol.104, 1995, pp.1613—1618.

②左亦鲁:《告别“街头发言者”——美国网络言论自由二十年》,《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

认为是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特殊形式。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大众媒介被默认为“铁板一块”的实体,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不应得到额外关照。大众媒介通过新闻专业主义、“把关人”机制来实现自我约束——比如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等报道原则,比如引用当事双方的观点,标注消息来源,按照事实本身的逻辑呈现报道等操作规范。大众媒介的表达除了新闻专业主义^①和“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等限制外没有其他更多的限制,而是否构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则交由法院来判断——在著名的“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和“五角大楼文件案”中,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处理方式就是延续了上述“街头发言者”的想象模式。

随着广播、电视媒介的出现,美国的言论自由问题开始将媒介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频谱资源的稀缺性、视听内容的侵入性和受众接收的低门槛,使广播电视媒体的言论自由面临更多的限制,“公共利益”成为界定言论自由的重要标准。为了监管广播、电视媒体,政府还专门成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根据官方文件,FCC一方面表明了它坚持言论自由的基本立场:“法律禁止FCC试图阻止任何观点的传播”^②;另一方面,在政治与公众节目中,FCC遵循“三个构成公共利益标准的核心规则”^③,制定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简称《规则》),对广播电台、有线电视系统、卫星直播服务中政治候选人出场和打广告的方式作出了相应的规范。《规则》介绍了确认广告赞助商和具有法律资格的公职候选人身份的细则,对“平等机会”原则、候选人费用、政治档案等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并设计了一套合理的准入机制,吊销那些不合规定的电台的牌照和施工许可证。

到了网络时代,参与到言论自由博弈中的主体更为多元,其手段更为多样。除了政府及其独立规划机构,还有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用户、媒体、行业协会、公民组织等,出于公共利益、行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而作出取舍和妥协,以保持一个微妙的动态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言论自由的“街头发言者”或“街头发言者+扬声器”的想象模式已经过时。伴随着多元主体的参与,继续进行言论自由论争的,将是一系列技术创新、立法与行政规制、市场竞争规律和觉醒的用户自主意识的共同作用。以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公司Facebook为例,它有一套公开的、完整的服务条款,对隐私、分享内容和信息、安全、注册和帐户安全、保护他人权利等若干问题作出了说明。具体到处理违规内容的问题上,Facebook以“社区守则”的形式向用户提出了行为标准,介绍了它将如何防控“真实的人身伤害风险或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如何鼓励“礼貌行为”,如何提倡“保护账户和个人信息安全”和“保护个人知识产权”,与之相对应,Facebook还提供了用户举报违背社区守则行为的具体做法。

2015年“伊隆尼斯诉美国案”^④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定位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问题。在该案中,宾夕法尼亚州的男子伊隆尼斯于5年前被指控在Facebook上发布暴力信息,被指控具有威胁。法院认为,仅根据人的思想(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威胁)不能定罪,然而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但是Facebook早就在“服务条款”(默认其用户认可)中写到“不得恐吓、胁迫或骚扰任何用户”,“不得发布传播仇恨言论、威胁或色情内容,煽动暴力的内容,或包含裸体或血腥或无端暴力的内容”,在“社区守则”中也有针对“可能对个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实质性威胁内容”的做法——移除。不少用户在新闻留言中表示,今后要注意自己在网上的言论。可是即使在伊隆尼斯本人被监视居住期间,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对法院判决的调侃。

正如前面提到的“萨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五角大楼文件案”和“伊隆尼斯诉美国案”所揭示的那样,如果一则言论在公共空间中引发了争议(包括民事争议、行政争议或者刑事问题),实际上就涉及

①尽管作为一种职业伦理要求的新闻专业主义,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

②这些法律包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1934年通讯法》。

③即平等机会规则、合理使用权规则以及公平原则。根据国内学者研究,“公平原则”因为违背了公共利益的规范,于2000年最终被废止。参见李丹林:《论美国广播法的公平原则》,《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0期。

④E. Bazelon, “Do Online Death Threats Count as Free Speech?”,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14.

表达者是否正常享有自己的言论自由、行使自己的表达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都要交由司法机关判断。司法机关的判断作为维护言论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判例(包括针对煽动性言论的判例、针对事实的虚假陈述的判例、针对淫秽、冒犯性言论、商业言论的判例等),为处理同类问题提供参考。同时,从这些判例中抽象出来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对于事实的虚假陈述”等标准,同样成为了日后定位言论自由边界的依据,但是具体到怎样判断的问题上仍然不清晰。

总而言之,言论自由的价值毕竟是抽象的,言论自由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难以把握的。具体判断言论的表达是否超越界限、表达权的行使是否恰当,需要综合考虑媒介形态、先前的判例等影响因素,需要建立具体的规则、机制,形成落实到个案上的具体做法。根据以上的梳理,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环境下,信息、言论的表达各自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约束机制。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伴随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怎样继续维护言论自由,确定言论自由的边界?就Facebook来说,尽管它向用户提出了行为标准,但面对争议时它是免责的,它不具备任何的强制力——它“并不控制或规定用户在 Facebook 上的行为”,“并不就用户在 Facebook 上传播或分享的任何内容或信息负责”,“并不就您可能在 Facebook 上遇到的任何冒犯性、不当、隐晦、违法或其他可能引起反感的内容或信息承担责任”,“并不就任何 Facebook 用户在线上或线下的行为承担责任”——面对谣言、假新闻的泛滥的网络环境,包括Facebook在内的主要社交网络更多地是通过与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合作的方式对其内容进行规范的。

二、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何为

研究“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前,先看看“事实”的问题。相对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标准,“事实”在确定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上是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不言自明的尺度:必须尊重事实;罔顾“事实”的言论不在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一旦超越了界限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国际人权公约》^①和《欧洲人权公约》^②在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中都提到了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这就限制了通过捏造和散布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和破坏他人名誉的诽谤行为。对普通公民的限制尚且如此,对影响更广泛、意义更重大的网络“政治口水仗”而言,它们的“事实”依据、与“事实”的符合程度更应该成为判断是否超越言论自由界限的依据。

所谓“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就是为了寻找、查证“事实”而存在的。它们是涉及事实争议的政府、企业、新闻采编单位等主体之外的“第三方”的、对新闻事实、政治言论进行核查、监督的地位相对独立的机构,在一则新闻、言论已经刊登、播放的情况下,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事实问题进行核查。这些为数众多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有的由传统主流媒体的特色栏目发展、演化而来,有的由独立的资深记者、网站编辑所创设,根据共同的目标、原则章程的指引开展事实核查工作。首先,它们的工作基于一种特定的基于事实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可被验证的事实”作为判断依据,坚定地相信“作出事实性声明的人应该为他们自己的话负责,并能够提供那些能够支持他们言论的证据”^③;其次,它们

^①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又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三款: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②根据《欧洲人权公约》(又称《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0条第二款:行使上述各项(表达)自由,因为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这些约束是基于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者公共安全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者犯罪,保护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或者权利,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的泄露,或者为了维护司法官员的权威与公正的因素的考虑。

^③PolitiFact,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fact”, PunditFact and the Truth-O-Meter,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article/2013/nov/01/principles-politifact-punditfact-and-truth-o-meter/> 2013-11-1 / 2017-8-10.

各自工作的侧重点不同,有的偏重对各种“都市传说”进行辟谣,更多的则是监督、核查政治人物的言论。最后,它们各自有一套公开透明、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从确定选题,根据选题寻找权威的资料来源,到分级处理,开展事实核查,形成研究报告,最后根据用户反馈的意见作出更正。

以下通过三家事实核查机构的具体运作情况,来考察美国在网络环境下对于内容是否真实是如何进行判断的具体机制。

这三家机构中,Snopes是由David Mikkelson建立的一项从1994年开始的工程,旨在研究各种各样的“都市传说”(Urban Legend),此后逐渐发展成互联网上历史最久的、规模最大的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是由《坦帕湾时报》(一家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报纸)的编辑和记者运营的事实核查网站,对当选官员和其他在美国政治中发言的人的说法的准确性进行分级。Fact Checker是由《华盛顿邮报》从2007年9月19日开办的,作为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特色专栏,旨在寻求政治人物重要言论的真相。它从2011年1月11日再度推出,并确立为永久性的特色栏目。截至目前,包括Snopes、PolitiFact、Fact Checker在内的多家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共同签署了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①倡导的原则章程,该原则章程确立于2016年9月15日,具体内容包括:对中立、公正的承诺;对资料来源公开透明的承诺;对资金和组织的公开透明的承诺;对方法公开透明的承诺;对开放和诚恳更正的承诺。现在,对于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来说,这些“庄严承诺”,既是他们开展工作所遵循的依据,又相当于一道“准入门槛”、一张“入场券”,因为社交网络公司Facebook此前宣布,在这个原则章程上签字是被接受为社交网络上的第三方事实核查者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反过来说,但凡未签署该原则章程的机构,便不被“认作”是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

Snopes、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的工作方法基本一致,它们从确定待核查的选题开始,进一步寻找有关方面权威、可靠的资料来源,再对照自身的分级标准细化处理,就事实核查的成果形成研究报告,最后根据反馈作出更正。不过Snopes、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稍有差别。

首先,在如何确定选题来源这个问题上,三家机构各有侧重。Snopes对有待核查的选题并不设限,它不仅仅专注于政治(尽管政治信息的事实核查占了工作的很大比重),也涉及其他社会热门话题,声称“在任何时候,在没有任何党派考虑的情况下,写下最大数量读者所询问和搜索的任何项目”^②。相应地,Snopes采取了较为技术化的手段来确定读者的兴趣——他们根据“进入我们搜索引擎的词语列表”、“读者提交的电子邮件”、“发布在我们Twitter和Facebook帐号上的评论和条目”、“外部社会化媒体上的发布”、“谷歌趋势”、“Facebook热门话题”、“Facebook用户做出标记的条目”^③,以此选择待核查的事实。与热衷对社会热点、都市传说进行辟谣的Snopes不同,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对各种政治言论进行确认。PolitiFact检查政客、官僚和相关组织在演讲、新闻报道、新闻通讯、活动手册、电视广告、Facebook发布和电视、广播采访记录上各种说法,但“只选择那些最具有新闻价值的和最重要的”^④,并且认真考虑“陈述是基于可被验证的事实吗?”^⑤等五个问题。Fact Checker与PolitiFact的具体做法类似,而更强调“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那些对选民最重要的议题上”,并突出读者的参与对于计划能够成功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事实核查大约有50%是从一个读者的问讯开始的”。虽然核查工作针对“事实”而展开,但“最具新闻价值”、“最重要”、“对选民最重要”的遴选标准却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当然,其中必然会有互相重合的部分——进而,凡是不被这些机构认为是具有这些价值的事实,自然也就不在被核查之列了。

①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是一个由Poynter媒体研究院主办的全球事实核查论坛。它成立于2015年9月,旨在推广卓越实践,并在事实核查领域进行交流。

②③Snopes,“Topic selection”,<http://www.snopes.com/topic-selection/> 2017-7-30 / 2017-7-30.

④⑤ffPolitiFact,“The Principles of PolitiFact”.

其次,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有必要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归类”、“梳理”来获得更清晰的认知,提高事实核查工作的效率——而这个“归类”、“梳理”的路径,就是三家机构的“分级系统”。每个分级系统按照一个或多个标准对待核查的事实划分出不同的等级,而每个等级都有各自严格的定义。一方面,分级系统提供了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进行裁断的依据、标准;另一方面,它又作为“标签”被附在经过鉴定、认证的事实或说法之上,以此来引导读者的认知。Snopes的分级系统以“能否被证实”等为依据,分出“事实”、“基本属实”、“混合”、“基本错误”、“未被证实”、“过期”、“正确引用”、“错误引用”和“传奇”九个等级。PolitiFact有三大分级系统,分别冠名为“真相标尺”(Truth-O-Meter)^①、“翻转标尺”(The Flip-O-Meter)^②和“承诺标尺”(The Promise Meter)^③,就“陈述反映真相的相对准确度”、“官员在某一议题上的一致性”和“当选官员对竞选承诺的履行状况”进行分级和裁断。The Fact Checker采取的分系统妙趣横生,命名为“匹诺曹测试”,其含义不言而喻。另外,Fact Checker还有一个叫做“累犯观察”(Recidivism)的特色栏目。

最后,三家机构进行事实核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依靠机构内的专业人士完成。首先,将待核查的选题分配给编辑部成员,搜集相关的背景资料,形成一个研究初稿。然后,根据选题的复杂度,交由其他对该领域更具备专业能力的成员,进一步深化。在成稿前,由至少一名文字编辑(line/copy editor)、至少两名内容编辑把关,检查标点、拼写、语法问题,以及内容是否充分、全面、中立等。在最终形成的网页上,有专门的“资料来源”版块中标注研究的参考文献,以确保其核查过程的透明性和作出结论的可信性。

三、事实核查方法的不足及其价值

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深受假新闻、“后真相”困扰的美国新闻界重新振作起来。可以说,它们正努力为网络言论表达的界限重新树立一个“事实”的尺度。当地时间2017年9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条推文称:“如果格雷厄姆·卡西迪法案(Graham-Cassidy bill)不包括对投保前已存在疾病的情况的覆盖,我是不会签署它的。但它确实做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法案。废除和替换。”PolitiFact对该说法进行了核查,认为特朗普并没有完全说错,但是他的推文回避了法案提供的一些陷阱。PolitiFact称,“该法案确实强调了投保前已存在疾病的情况,如果各州想要获得联邦层面上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他们必须表明他们打算保持覆盖面,并且负担得起。但该法案的其他部分却允许各州放手让保险公司向那些人收取更高昂的保险费。”^④PolitiFact援引了几位研究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教授们的观点,指出该法案关于投保前已存在疾病的情况的用语是模糊的,而且接受广泛的解释。此外,教授们还说:“该法案削减了三分之二的州的资金,这将使他们更难保护人们的过去的健康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法案中的保护措施都不等同于今天的美国人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下的保障——他们更少了。”^⑤从PolitiFact的“真相标尺”来看,特朗普的这篇推文中有一个真实的元素,但它“掩盖了关键的细节”。所以他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基本错误”(Mostly False)的。

按美国开国元老们的制度设计,新闻业作为“第四权力”必须监督政府,必须通过它所充分享有

①“真相标尺”旨在反映陈述的相对准确度,有六个等级;按照真实度降序排列,分别是真实、基本真实、一半真实、基本错误、错误、完全荒谬。

②“翻转标尺”为一名官员在某个议题上的一致性进行分级;反转标尺有没有翻转、一半翻转和完全翻转三个标尺。

③“承诺标尺”对当选官员的竞选承诺的状况进行分级,有五个等级:尚未分级、在进行中、妥协、遵守承诺、未能兑现。

④PolitiFact, “Trump’s misleading claim on pre-existing protections in Graham-Cassidy”,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statements/2017/sep/21/donald-trump/trumps-misleading-claim-pre-existing-protections/2017-9-21/2017-9-27>.

⑤PolitiFact, “Trump’s misleading claim on pre-existing protections in Graham-Cassidy”.

的新闻自由,为人们提供客观、准确的事实报道——这是人们理性地判断自身处境的依据,更是维持民主运行的基础。由此看来,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之所以搜集材料数据,作出事实核查报告,与其说是受到“后真相时代”针对政客、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情绪的影响,不如说它们是出于理想化的目标,通过更准确、更客观地还原事实,以实现民主生活的重建。同时,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并不采取强硬手段整治“假新闻”、“谣言”,也并不认为经过它们核查的事实就是最终的、全部的真相,而是依赖公众的理性,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们鼓励用户参与他们的工作,在报告中留有足够多“更正和检查”的空间和途径,更标注清楚全部参考资料的来源。

但是,进行事实核查的方法可能显得有些简单化、机械化,其效果也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显著。首先,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倾向于将公共话语的研究简化为事实真假^①、对错的判断,并且只按照特定的标准去遴选、核查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实”,但问题是可被验证的“事实”毕竟只占少数,那些不被认为有价值的“事实”只能被排除在待核查范围之外;更有甚者,把原本属于价值判断或理论探讨层面的问题强行套进事实核查的解释框架中,得出的结论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比如,有议员在专栏文章中称“奥巴马医保违宪”,这一言论被PolitiFact认为是“虚假”的,因为“只有最高法院判断其违宪这一说法才是事实”^②。其次,是滞后性的问题。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工作只能在一则新闻已经传播,并产生社会影响的时候介入。同时,尽管他们之中有的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新闻机构”,但它们实际上并不通过新闻采访实践去占有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只是被动地搜集材料,进行二次加工,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滞后。最后,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在选择核查事实的问题上有时存在党派偏见。有研究发现,PolitiFact更容易选择共和党的失实言论作为核查对象。从研究样本上看,被标注为“失实”或“荒谬”的98篇文章,共和党人占76%,而民主党人仅占22%。而在此期间是民主党掌控国会,因而更有可能发表失实言论。^③

尽管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并不能因此否定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价值。“事实”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作为“事实”核查者、提供者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它为人们理性地判断表达自由是否超越界限提供了可信的参考依据,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能避免公权力部门介入调查、审理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等问题。当前,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正根据批评意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持续地作出重要调整,以更好地投入到业务实践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④报告中肯定了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肯定了知情权和表达权等对于基层民主的重要性——而采取第三方事实核查机制,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实现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

据了解,我国的腾讯等网络平台型企业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辟谣中心”、“较真平台”,同时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共同清理谣言、假新闻泛滥的社交网络环境。那么美国的经验是否适用?或者能否提供参考和借鉴?正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保障了我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我国在互联网内容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备和具体。比如根据《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⑤,作为主管部门的“网信办”是参与信息内容治理的重要主体;用户^⑥在注册账号时需要与平台企业^⑦签订协议,承诺遵守包括“信息真实性”在内的“七条底

①②③万小广。从PolitiFact看新传播生态下的“事实核查”[EB/OL]. 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sysj/201409/t20140912_365066.htm 2017-7-28/2017-8-1。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⑤由网信办于2014年8月7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行。主要内容包括: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需取得资质;强调保护隐私;实名注册,遵守“七条底线”;公众号需审核备案;时政新闻发布设限;明确违规如何处罚等。

⑥⑦《规定》中的规范表述为“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

线”，而违反协议约定的用户，由平台企业根据情节采取限制措施（包括警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和关闭账号）并向主管部门报告。在实践中，平台企业也会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信息内容治理，比如微信辟谣平台要求第三方机构为医疗、行政、教育类机构，以确保其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是目前成效不太明显。就美国的情况来说，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下，由于互联网不像广播电视一样存在“频率资源稀缺”等问题，政府找不到合法理由介入网络内容的监管，所以对网络内容的规范更多地要靠自律、靠法律（这里不是政府机关执法，而是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提起民事诉讼，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介入侦查）来解决——那么在此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自律？如何在形成诉讼之前判断表达是否超越边界？进而，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言论秩序？最好的办法是依靠各种社会性机制，其中就包括第三方事实核查等。

可见，尽管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迥然相异，但两国对第三方事实核查的客观需求是一致的，作为“底线”要求的“信息真实性”与作为言论自由边界的“事实”之间是互相契合的。那么，在实践方法上理应也有相通的地方。目前，国内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在操作方法上还不成熟，对事实的判断往往采取“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要么先贴上“谣言”的标签再做解释，要么索性不予考虑，不纳入事实核查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前文提到的Snopes、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设计巧妙的分级系统值得参考，它们更有助于识别、分析那些更隐蔽的、事实和谣言掺杂的内容。

回到网络环境下的表达权行使以及表达是否超越界限的判断等问题上，本文梳理了美国在不同媒体形态下对于言论表达的限制，参考了历史上的关于言论表达的经典判例，发现在网络时代，尽管表达自由仍然是重要的价值，但过去的标准、机制已经不再适应急剧变化的新环境。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的出现，为规范言论表达重新确认了“事实”的尺度，为治理谣言、假新闻泛滥的网络空间，保护网络表达自由找到了折衷方案。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主要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运行的机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借此向面临同样挑战的中国提供一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责任编辑：杨嵘均）

Taking Fact as the Only Criterion: The Boundary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ird-Party Fact Checking

LI Dan-lin, CAO Ran

Abstract: In the network era, the normative and restrictive mechanism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nvironmen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seek new mechanisms for us to judge whether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is properly exercise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al issue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on coming from non-media organizations or the non-media professional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third-party 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e. Snopes, PolitiFact and Fact Checker,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boundary of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in the network era. Although speech freedom is still an important value cherished in network era, the normative and restrictive mechanism cannot match the constant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practice of third party fact-checking has re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fact as the only criterion, which provides us with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in cyber space which is filled with rumors and fake news. All this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of opinion expression in cyber space in China.

Key words: online expression; freedom of speech; fact checking; social media